

文化负载词的跨语传递：杜诗吉叶墨译本中的意象转化与文化适配

唐文博, 李美琪*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HASS.2026030039

摘 要： 杜甫诗歌是中华诗歌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推动其西班牙语译介，既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实践，也是促进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吉叶墨（Guillermo Dañino）的杜甫诗歌译本为考察对象，在梳理当前译介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其翻译策略与处理手法，进而提出“系统性补偿”与“动态适应”的适配路径。研究旨在细化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精度，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语传播与全球接受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思路与实践方案。

关 键 词： 文化负载词；杜甫诗歌；西班牙语翻译；吉叶墨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Imagery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in Guillermo Dañino's Translation of Du Fu's Poems

Tang Wenbo, Li Meiq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Du Fu's poems are the core component of Chinese poetry culture. Promoting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is not only a key practice for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takes Guillermo Dañino's translation of Du Fu's poe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urrent translation common issues, it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handling methods, and then proposes the adaptation paths of "systemic compensation" and "dynamic adapt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refine the translation accuracy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and provide reference theoretical idea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Spanish dissemination and global accept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words： cultural loaded words; Du Fu's Poems; Spanish translation; Guillermo Dañino

在中国积极推进“文化出发”战略，积极构建人类共同未来的共同体的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宝藏的中国古典诗，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重要实践。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以忧郁的文体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高尚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方兴未艾，就中文、英语、法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富，且渐成体系。相较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则相对滞后^[1]。这种现状不仅制约了杜诗在西语世界的深度传播，也不利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对话^[2]。

秘鲁作家吉叶墨^①的作品《笔林·杜甫诗选》（*Bosque de pinceles: poemas de Du Fu*）共收录翻译150首杜甫诗歌，是西语世界规模最大、篇目最全的杜诗直接译本。该译本不仅在翻译数量上具有开创性，更在文化意象的传递上做出了诸多有益尝试，为研究杜诗西译的文化适配提供了珍贵的文本依据^[3]。基于此，本文主要依据该作品为核心文本，聚焦杜诗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旨在揭示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意象转化困境与适配策略。

一、文化负载词内涵及在杜诗中的分类

（一）文化负载词内涵

“文化负载词指某一文化中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的词语”^[4]，承载着独特历史、社会、宗教或民俗信息的词汇。它们反映了特

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5]。由于文化负载词与源语文化的绑定性极强，当它们进入异质文化语境时，往往会因为目标语读者缺乏相应的文化图式^②而产生理解障碍，即“文化词汇空缺现象”^[6]。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直接决定了源

基金项目：吉林外国语大学202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传播学视角下吉林省博物馆文物西班牙语翻译策略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JW2024ZXYP012）；吉林外国语大学202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认知语言学视域下《中国关键词》系列丛书核心术语西班牙语翻译策略和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W2024BSQN007）。

作者简介：唐文博（2006—），男，汉族，2024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通讯作者：李美琪（1994—），女，汉族，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

语文化意象能否被准确、完整地传递。

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杜甫的诗歌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不仅是构成杜诗“诗史”特质的核心要素，也是其跨文化传播的难点所在^[7]。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若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很难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8]。唯有先明确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与传递困境，才能为后续的翻译策略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杜甫诗歌中文化负载词的分类

在杜甫的诗歌中，具有文化分量的文字，作为承载历史记忆和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地域特征、社会制度，还通过丰富的文化隐喻和民俗意象，展现了诗人的家国情怀和政治理想，以及社会生活的细节。

历史地理类文化负载词，是杜甫记录时代风貌的典型意象，涵盖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地域名称与社会制度。典型如《秋兴八首·其二》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京华”所指的“长安”，早已超越普通的地理名词，成为盛唐王朝的象征，承载着诗人深沉的家国之思。这类文化负载词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情感象征性，正是杜诗“诗史”价值的直接体现。

自然意象类文化负载词多被赋予深厚的文化隐喻意义，如“雁声”映射诗人的漂泊孤苦，《月夜忆舍弟》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戍鼓”“雁声”不仅描绘了边塞军旅生活的艰苦，更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承，让后世读者能共情诗人对战争的反思^[9]。这类意象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以自然物象为媒介传递诗人的主观情感，是杜诗抒情性的核心表达载体。

民俗礼仪类文化负载词根植于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民俗传统，如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茱萸”不仅是重阳节插戴的植物，更承载着古人避灾祈福的民俗心理与对生命存续的深层感慨。这类文化负载词以民俗场景为依托，既是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写照，也是杜甫情感与时代文化交织的重要载体。

二、杜诗西译中文化负载词意象转化的难点

在杜甫诗歌的西班牙语翻译中，历史地理类文化负载词因其蕴含的深层时空坐标与文化象征，构成显著的翻译障碍。以“长安”为例，西班牙语译者若直译为“Chang'an”，虽能保留地理名称的准确性，但无法传递其在中文语境中作为“京华”或“帝乡”所负载的政治寓意与情感厚度；若意译为“capital imperial”（帝都）或“centro del esplendor”（繁华中心），虽能部分捕捉其象征意义，却可能牺牲历史具体性，导致原诗“诗史”特性的削弱。这种翻译困境的核心在于，历史地理名词不仅是空间标识，更是历史记忆与集体情感的凝结，译者必须在名称的可识别性与文化象征的可理解性之间寻求平衡。

自然意象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点在于，其隐喻意义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与自然哲学，而在西班牙语文化中缺乏完全对应的象征体系。例如“雁声”在中文里常与羁旅、思乡、孤寂相连，其季节性南飞的特征使之成为传递音讯或孤独哀鸣的经典意象，但在西班牙语诗歌传统中，“ganso salvaje”或“ave migratoria”未必能自动唤起同等的情感共鸣。译者可能需要通过添加修饰语如“ganso solitario del otoño”（秋日孤雁）或借助动词如

“graznar con melancolia”（悲鸣）来注入情感色彩，但此举又可能使译文显得冗余，破坏原诗的凝练与含蓄之美。

民俗礼仪类文化负载词与唐代具体的节日习俗、民间信仰紧密相连，而这些习俗对于西班牙语读者而言往往陌生且缺乏直接体验。例如“茱萸”，在重阳节佩茱萸以避灾的习俗，使其在杜甫诗中不仅是植物，更是祈福、避邪与生命感慨的仪式性符号。若仅音译为“zhuyu”或泛化为“planta”，则完全丢失了其民俗功能与文化情感。这类负载词的翻译，本质上是将一种文化特有的仪式符号转化为另一种文化可理解的表达，译者必须在保持诗意简洁与提供必要文化背景之间做出权衡。

三、基于吉叶墨译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案例分析

（一）历史地理类文化负载词：

关于历史类文化负载词，以《忆昔》一诗中的“开元”为例，该词指唐玄宗年号（公元713年至741年），其背后是“开元盛世”这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时期，象征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吉叶墨在翻译中将其直译为“época Kaiyuan”，并辅以文后注释：“Kaiyuan es una época durante el gobierno de los Tang, en su tiempo la más próspera en el mundo”^{[10][47]}。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双重策略：一方面，通过直译保留原词的音韵与形式，确保文化符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借助注释补充历史背景，帮助西班牙语读者理解其超越字面的文化内涵。

地理名词是历史地理类文化负载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需要同时兼顾地理属性与文化意象的传递。以杜甫《野老》一诗中的“剑阁”与“琴台”为例，这两个典型地理名词，一个以“剑”为核心意象，一个以“琴”为文化符号，都承载着独特的地理背景与文化联想。吉叶墨的译法颇具代表性：他将“剑阁”译为“el Paso de la Espada”，既通过“Paso”（关隘）点明其军事要塞的地理属性，又保留了“剑”的意象；而“琴台”则译为“la Terraza del Laúd”，用“Terraza”（平台）体现其空间特征，再通过“Laúd”（琴）的译法，传递出它与音乐、文人雅趣的关联。从吉叶墨的实践可以看出，地理名词的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对原作文化内涵的阐释与重建。译者既要尊重原文的文化特异性，也要让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具备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

（二）自然意象类文化负载词：

菟丝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自然意象，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里的名句：“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这句诗用“菟丝缠绕女萝”的比喻，描绘出新婚夫妇相互依存、亲密难分的关系。而在杜甫的《新婚别》中，这一意象被赋予了更复杂、更沉郁的内涵：“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杜甫把原诗中的“女萝”换成了“蓬麻”——一种茎秆柔弱的植物。再以“引蔓故不长”的细节，既保留了菟丝意象里“依附”的核心含义，又通过两种植物生长特性的对比，把原诗里单纯的亲密依附，转化成对乱世婚姻中脆弱关系的深沉思考。

吉叶墨在翻译此句时，将其译为：“Trepando entre cáñamos y juncos, la hiedra se adhiere con sus fuertes zarcillos.”^{[10][75]}。在这一译文中，“兔丝”被处理为“hierba”（草），这一选择看似偏离了原词的植物学指称，实则体现了译者对意象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首先，“hierba”在西班牙语中可泛指“草本植物”，与

“兔丝”作为寄生植物的生态特征形成隐性关联；其次，译者通过“trepando”（攀爬）与“adhiere”（依附）的动词组合，精准传达了原句中“附”的动态过程，同时以“fuertes zarcillos”（强壮的卷须）强化了依附的紧密性，间接呼应了中文意象中“柔弱”与“依托”的辩证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原诗的含蓄美感，又通过语言转换实现了文化意象的跨文化传递。

（三）民俗礼仪类文化负载词：

在杜甫诗歌的翻译实践中，民俗礼仪类文化负载词往往根植于特定的历史习俗与生活实践，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直接对应物。例如，在《对雪》一诗中，“瓢弃樽无绿”中的“瓢”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生活器具，常用于盛茶酒，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吉叶墨将其译为“cucharón”（大勺），这一选择虽在字面上实现了功能对等，却因西班牙文化中无此器物而造成文化意象的断裂。为弥补这一缺憾，译者通过注释详细解释：“Este cucharón, piao, hecho con la mitad de una calabaza, servía para verter el vino en los vasos o tazas”^[10]⁴⁶⁹，以说明其材质与用途，从而在目标语中重构原意象的文化语境。这种策略既尊重了原文的文化特异性，又通过创造性转换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实现了文化传递与读者接受的双重目标。

此外，在《秋兴八首·其一》中，“急暮砧”指代古代中国民间洗衣的捣衣声，这一习俗在西班牙文化中同样缺失。吉叶墨译为“rítmicos golpes de piedra”（石头敲击的节奏），虽在形式上模拟了声音的节奏感，却因文化语境的断裂而难以传达其实际意义。为澄清这一意象，译者通过注释解释：“Las mujeres lavan ropa golpeándola con piedras a la orilla del río”^[10]⁴⁷⁸，以说明其具体活动与文化功能，从而在目标语中重建原意象的民俗图景。这种处理方式凸显了译者对文化隐喻的深度解析与跨文化转译能力，通过将抽象的声音意象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场景，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原诗的意境。

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启示与实践原则

（一）文本内核策略的精细化与动态选择

应根据文化负载词的类型及其在诗中的功能权重，动态选择并组合不同的核心策略。对于高文化专属性的历史名词、制度术语，音译/直译加体系化注释仍是基石，但注释本身应力求精准、互文，构成一个帮助读者建立历史文化认知图式的知识网络。对于自然意象和民俗词汇，策略应更趋灵活：可采用“功能性释义”，在诗行内通过添加限定成分或重构场景来显化其文化功能；或采用“联想迁移”，在确认跨文化情感共通点的基础上，用目标语文化中

能引发相似联想的物象进行部分替代或烘托，同时通过上下文或注释保留其文化源头信息。

（二）译者主体的显身与跨文化身份的发挥

我们应重新认识和重视译者，特别是像吉叶墨这样的跨文化学者-译者的主体性。优秀的译者不仅是语言的桥梁，更是文化的对话者与诗歌的再创作者。其深厚的源语文化研究功底、对目标语文学传统的熟稔以及个人的诗学才华，共同决定了翻译的最终品质。鼓励并培养更多具备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视野的译者，是提升翻译质量的根本^[11]。

（三）确立以“目的语读者可共鸣性”为导向的传播伦理

翻译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在异国文化中制造一个仅供观瞻的、封闭的“文化标本”，而是为了促成跨文化的理解与共鸣。这意味着在坚持文化真实性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与“可共鸣性”。翻译策略的取舍都应在深度理解目标语读者认知图式、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成功标志，在于目标语读者能否透过语言和文化的表层差异，触及并共情于杜甫诗歌中超越时空的普遍人类情感。实现这种深度共鸣，才是跨文化翻译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并“走进去”的关键。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杜甫诗歌的吉叶墨西译微观文本分析，本文总结出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面临的意象转化困境与所采用的适配策略，力求更有效地推动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在西语世界的“精准传播”与“大众接受”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我们必须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传播的宏大视野下，以深度文化阐释为前提，以双语诗学重构为核心方法，以系统性策略矩阵为实操工具，并以促成跨文化共鸣为最终导向。这为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既保持中国古典文学的本真韵味，又赋予其崭新的、活跃的生命力，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路径与实践原则。

注释：

①吉叶墨（Guillermo Dañino Ribatto, 1929–2023），秘鲁汉学家、翻译家，秘鲁天主教大学与圣马尔科斯大学教授，主要代表作 *Bosque de pinceles* 等，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

②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认知心理学与跨文化交际学核心概念，指特定文化群体成员基于共同生活经验形成的共享认知框架与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 [1] 代泽萍. 唐宋诗词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D]. 吉林大学, 2023.
[2] 张西平. 西方汉学研究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3] 王晓阳. 秘鲁汉学家吉叶墨的汉学译介活动考论 [J]. 国际汉学, 2023, (03): 137–141+159.
[4] 皇甫雨嫣. 探纵理论视域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为例 [J/OL]. 现代语言学, 2022, 10(4): 739–745[2026-02-04].
[5]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6] 赵媛媛, 刘艳茹. 外宣翻译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西译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 6(33): 165–168.
[7] 朱曼怡. 跨文化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J]. 英语广场 (学术研究), 2025(09): 23–26.
[8] 王银泉. “福娃”英译之争与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策略 [J]. 中国翻译, 2006, 27(3): 74–76.
[9] 丁若哈, 王俊峰. 杜甫诗歌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J]. 今古文创, 2021, (24): 112–113.
[10] Dañino, G. *Bosque de pinceles* (Du Fu) [M]. Madrid: Editorial Hiperión, 1998.
[11]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